

美国传教士伯驾
在华活动研究

(1834—1857)

谭树林 著

上海醫局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070.071.2

美国传教士伯驾 在华活动研究

谭树林 著

(1834——1857)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华活动研究: 1834 ~ 1857 / 谭树林著. —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80256 - 102 - 1

I. ①美… II. ①谭… III. ①伯驾, P. (1804 ~ 1888) — 人物研究②中美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研究 — 1834 ~ 1857 IV. ①B979. 971. 2②D829. 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5833 号

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华活动研究 (1834 ~ 1857)

责任编辑 陈丹丹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地 址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邮政编码 100006

网 站 www.qypublish.com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办 010 - 65265404 65138815

编 辑 部 010 - 65276609 65262436

发 行 部 010 - 65263345 652202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 - 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

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

封面设计 齐立娟

装帧设计 美信书籍设计工作室

印 刷 北京虹之彩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6 - 102 - 1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伯驾奉派来华	13
一、伯驾来华的历史背景	13
(一) 19 世纪美国对华贸易的发展	13
(二) 美国海外传教事业的兴起	27
二、伯驾来华	47
(一) 伯驾早期宗教教育	47
(二) 伯驾海外传教目标的确定	56
(三) 伯驾来华	61
第二章 传教士：伯驾在华的宣教活动	67
一、伯驾在华的传教形势	68
二、伯驾之前美国在华的传教事业	74
三、伯驾在华的传教活动	89
(一) 伯驾的中文学习	89
(二) 伯驾的传教方式及传教活动	96
第三章 医生：伯驾在华的医疗事业及其影响	105
一、伯驾以前来华传教士与西方医学的传华	105

二、伯驾从事医药传教的缘起与准备·····	113
三、伯驾在华的医疗事业·····	119
(一) 开设广州眼科医局·····	120
(二) 发起成立“中国医药传教会”·····	129
四、伯驾在华医疗事业的影响·····	141
 第四章 翻译家：伯驾译介西方国际法及其影响 ·····	164
一、近代西方国际法的产生及其传入中国的历史·····	165
二、伯驾译介西方国际法的缘起·····	169
三、西方国际法被首次译成中文·····	178
四、西方国际法首次传入中国的影响·····	184
 第五章 外交官：伯驾在华的外交活动（上） ·····	195
一、美国传教士卷入对华外交的原因·····	195
二、伯驾与《望厦条约》·····	204
(一) 伯驾与顾盛使团的派遣·····	205
(二) 顾盛使团的中文翻译及谈判策略的策划者 ·····	212
(三) 伯驾与条款的制订·····	222
 第六章 外交官：伯驾在华的外交活动（下） ·····	243
一、伯驾的修约活动·····	243
(一) 修约缘起与第一次修约的失败·····	243
(二) 伯驾的修约及其结果·····	260
二、伯驾的侵台政策·····	275
(一) 美国对台湾的早期认识及谋取台湾的设想 ·····	276

(二) 伯驾的侵台政策	291
结 语	303
附录 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	306
征引参考文献目录	314
后 记	327

绪 论

基督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其入华历史可分为四期：“第一期是唐朝的景教，第二期是元朝的也里可温教，第三期是明清的天主教，第四期是清朝以后的耶稣教。”^① 唐代景教和元代天主教传入中国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留下深刻印痕。诚如美国教会史家赖德烈（K. S. Latourette）所说：“据我们所知，中国如果过去未曾传入过景教，或蒙特高维诺等方济各会传教士也从未被罗马教会派遣，从欧洲经历那么长而艰难的旅程来中国，那末，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也不会和今天有什么不同。”^② 而明清时期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成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使中西文化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真正意义的直接交流。^③ 他们采取以学术辅助传教的方针，不仅藉此把西方的科学知识，如天文学、数学、医学、军事、火炮铸造技术等输入中国，促进了西学东渐，而且以此赢得了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的好感而

① 陈垣：《基督教入华史》，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3页。

② 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与开封犹太人》，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年，第128页。

③ [法] 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和基督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页。

受洗入教，使天主教在华传播出现了一度兴盛的局面。然而，利玛窦采取的传教策略不仅在耶稣会传教士内部遭遇诘难，特别是遭到多明我会、方济各会教士的攻击，由此掀起了长达百年之久的礼仪之争。礼仪之争不仅葬送了利玛窦开创的一度成功的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结果乃使雍正以后一百二十余年，天主教上为朝廷与地方官所禁止，下为民间所排斥”^①，并使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士掀起的第一次中西文化的真正交流因清政府的禁教而被阻断。

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受伦敦传教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来华，标志着新教入华的开始。^② 在华期间，马礼逊倡导的译圣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以及出版印刷等事业，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如果说利玛窦是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开拓者，那么马礼逊就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更直接、更久远。在其影响下，英美派遣来华的传教士均致力于出版、教育、医疗等事业，对中国近代化影响甚巨。由于早期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对中国的颛预无知，对华外交事务几乎全部倚重名义上是翻译或秘书的来华新教传教士，所以在19世纪中美早期外交关系及对华外交政策的制定上，美国来华传教士

①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1008页。

② 关于基督教新教始传中国时间，学术界尚存异议。龙基成主张新教传入中国应以17世纪荷兰新教传教士在台湾土著人中传布为始。见龙基成：《基督新教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十七世纪的荷兰传教士与台湾平埔族》，载《文史知识》1990年第2期；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以1807年马礼逊来华为起始，美国学者保罗·科恩也认为，“不算十七世纪中叶荷兰新教徒在台湾传教的失败在内”，主张“新教在华的事业始于1807年伦敦会的马礼逊（1782～1834）之来华”。见〔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89页。

曾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美国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实际上也是早期中美关系史的一个重要内容，美国中国学巨擘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即认为“研究在华传教士是了解中美关系的主要钥匙”。^①台湾著名学者李定一先生亦指出：“这些在华的美国传教士的工作，对于中国的影响，极其广大深远，是任何研究中国近百余年史事的人所不容忽视的事实。……中美两国关系密切，有着传统的友谊。追溯源本，美国在华的传教事业，是造成这种‘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②

所以，美国在华传教士问题研究无论对美国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早期中美关系史，抑或中美文化交流史均极具意义。但是，学界关于美国来华传教士问题的研究，与对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相比，显然要薄弱得多。费正清在谈到关于新教传教士的研究状况时即指出：“在19世纪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是研究最少，却是最有意义的人物。”^③目前学界对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的研究，即可作如是观。作为美国基督教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医学传教士，在华期间，伯驾集传教士、医生、外交官、汉学家于一身，在传教、政治、外交、文化交流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但迄今为止，有关伯驾的研究却远不尽如人意。比较而言，西方学界特别是美国学界对新教传教士的研究起步较早，在新教传教士入华初期，即有部分传教士的传记、回忆录出版。1834年，雅裨理所著《居留中国及邻近国家日记》（*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China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with*

① S. W. Barnett and J. K. Fairbank,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

②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7页。

③ S. W. Barnett and J. K. Fairbank,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p. 2.

A Preliminary Essay on the Commencement and Progress of Missions of the World) 在纽约出版, 该书为最早出版的美国来华传教士日记。继其之后, 一批在华美国传教士的日记、回忆录相继推出: 1864 年, 由第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夫人伊丽莎·J. 裨治文 (Eliza J. Gillet Bridgman) 编辑的《裨治文生平与事业》(*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 to China, The Life and Labor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① 在纽约出版; 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之子卫斐列 (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编撰出版《卫三畏生平与书信》(*The Life and Labor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Missionary, Diplomatist, Sinologue*)^②; 史蒂文斯 (G. B. Stevens) 和马尔库维克 (W. F. Markwick) 合作编辑出版《伯驾生平、书信和日记》(*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③, 是一部伯驾通信和日记的合集, 为伯驾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近年出版的迈克尔·拉齐克 (Michael C. Lazich) 的《裨治文 (1801 ~ 1861): 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E. C. Bridgman (1801 ~ 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④ 利用大量第一手的美部会档案, 研究了裨治文在华活动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对伯驾在华活动亦有所涉及。

① Eliza J. Gillet Bridgman,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New York, 1864.

② 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The Life and Labor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Missionary, Diplomatist, Sinologue*, New York, 1889. 该书 1972 年又同时在纽约和伦敦再版。该书已有中译本, [美] 卫斐列著, 顾钧、江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③ G. B. Stevens and W. F. Markwick,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Boston, 1896. 该书于 1972 年在波士顿和芝加哥再版。

④ Michael C. Lazich, *E. C. Bridgman (1801 ~ 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Lewiston,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0.

一些总论性著作也涉及到伯驾在华活动，像加拿大传教士季理斐（Donald Mac Gillivray）编辑出版的《基督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 ~ 1907)*）^①，该书对新教各差会在华活动均有所论及，极具参考价值；1929年，美国宗教史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出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通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②是一部长达900余页的中国基督教通史，对鸦片战争前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也以相当的篇幅予以叙述，对伯驾在广州的医疗事业亦有所涉及，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基督教史最好的一部深入和完整的通史著作。^③1931年，美国学者丹敦（George H. Danton）出版《中美早期文化接触（1784 ~ 1844）》（*The Culture Cont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 ~ 1844*）^④，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美国传教士来华的原因以及传教活动对中美文化交流的影响。

美国传教士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历来是传教士问题研究的热点之一。赖德烈的《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 ~ 1844）》（*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 ~ 1844*）^⑤、丹涅特（Tyler Dennett）的《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

① Donald Mac 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 ~ 1907)*, Shanghai, 1907.

②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1929.

③ 孙尚扬、[比利时]钟鸣旦：《一八四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④ George H. Danton, *The Culture Cont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New York, 1931.

⑤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 ~ 1844*,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7. 该书已有中译本，[美]赖德烈著，陈郁译：《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 ~ 1844）》，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Americans in East Asia: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①、普里斯（Allen T. Price）的博士论文《在美国差会与美国外交（1830～1900）》（*American Mission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1830～1900*）^②等，都对伯驾在华外交活动有所涉及。对伯驾在华外交活动较深入研究的是爱德华·古利克（Edward V. Gulick）出版的《伯驾与中国的开放》（*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③，该书虽然是一部有关伯驾的人物传记著述，但对伯驾为推动美国政府派遣顾盛使团、确立美国对华政策等所做的许多活动和努力，有较详细的论述，凸显了伯驾在早期中美关系中的地位；慕瑞·鲁宾斯坦（Murray A. Rubinstein）的《英美在华传教事业的起源（1807～1840）》（*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④，对鸦片战争前伦敦传教会和美部会在广州、澳门地区的活动进行了探讨，自第六章后作者重点陈述了美国来华传教士裨治文、雅裨理、卫三畏、伯驾等的活动及影响。由于作者应用了大量的差会档案，“使该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⑤。

①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 Asia: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22. 该书已出版中译本，[美] 泰勒·丹涅特著，姚曾真译：《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② Allen T. Price, *American Mission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1830～1900*, Harvard University, 1934.

③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④ 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London: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Lanham, Md., 1996.

⑤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1页。

伯驾在华的医疗事业是学界研究得相对较为充分的方面。早在19世纪30年代传教士创办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就不断刊发有关伯驾在华医疗活动的文章;1861年,英国医学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撰写《医学传教士在中国》(*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对1860年以前的医学传教作了较为全面、细致的梳理,其中涉及到伯驾在华医疗事业;嘉惠林(William Warder Cadbury)与琼斯(Mary Hoxie Jones)著的《在柳叶刀的刀刃上——博济医院百年史,1835~1935》(*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 ~ 1935*)^①,是一部有关博济医院研究的专著,对伯驾在华医疗活动及其影响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19世纪中国广州医院和医药(1835~1900)》(*The Canton Hospital and Medicin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1835 ~ 1900*)^②和《在华新教医药传教士》(“*Heal The Sick*” was Their Motto-The Protestant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China)^③两书也对伯驾在华的医疗事业及其影响有所涉及。前揭爱德华·吉利克(Edward V. Gulick)《伯驾与中国的开放》,除对伯驾在华外交活动进行论述外,对伯驾在华医疗事业也着墨颇多,尤其是作者把伯驾的医疗活动同中西文化交流结合起来,强调了伯驾的医学传教活动对中国西医学发展的贡献。此外,还有数篇论文,涉及到伯驾在华活动的不同方面。

① William Warder Cadbury and Mary Hoxie 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 ~ 1935*, Shanghai, 1935.

② Sara Waitstill Tucker, *The Canton Hospital and Medicin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1835 ~ 1900*, Indian University, 1982.

③ G. H. Choa, “*Heal The Sick*” was Their Motto-The Protestant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与国外相比，中国学者（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对于伯驾的研究更为薄弱。台湾、香港学界总起来讲颇为重视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无论是总论性著作还是专题研究，都取得相当成果。有关伯驾研究较重要的是李定一的《中美早期外交史》^①，该书对伯驾在华的外交活动，包括推动美国政府派遣顾盛使团来华、伯驾与 1856 年修约以及伯驾的侵台政策及后果等，有较为详细的考查；黄嘉谟的《美国与台湾（一七八四～一八九五）》^②梳理了自 1784 年至 1895 年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美国传教士在美国台湾观形成中的作用，对伯驾的侵台政策有较深入的分析。但是，关于伯驾的研究专著至今尚付阙如。

与港台学界相比，大陆学者对来华传教士的研究起步要迟得多。1949 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特定的政治背景与历史原因，学术界虽然也有一些研究^③，但都对传教士在华活动采取全盘否定态度。对传教士真正的学术研究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1981 年，顾长声出版《传教士与近代中国》^④，这是 1949 年后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以近代来华传教士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作者广觅中外文史料，对传教士参与军事、外交、政治、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的活动给予比较系统的介绍。但该书未能超越“文

①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在 1997 年出版了该书简体本。

② 黄嘉谟：《美国与台湾（一七八四～一八九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 年。

③ 以医疗方面的研究为例，如王吉民：《伯驾利用医药侵华事实》，载《医史杂志》，第三卷第三期；顾杏元：《基督教会医院与帝国主义侵略》，载《人民保健》，1960 年第 1 号等。

④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该书曾于 1991 年、2004 年分别修订再版。

化侵略模式”，“论述传教士的侵略活动有余，而对传教士的文化、教育、出版活动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略嫌不足，涉及宣教本身的内容则更少”^①，尤其“在传教士沟通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情况阐述偏少”，作者对此也予以承认。^② 1985年，顾长声又出版《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③一书，选取了比较有影响的29位来华新教传教士，分别为之立传，伯驾列于其中第6位，这是国内公开发表的有关伯驾的第一篇专论。该文对伯驾的外交活动论述颇多，但对伯驾在华医疗事业及对中国近代西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论述明显不足，宣教活动则几乎没有涉及。乔明顺的《中美关系第一页——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④，较为详细地论述了顾盛使团来华的经过以及《望厦条约》签订的全过程，指出了伯驾在敦促美国遣使来华以及在条约签订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王立新所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和教育活动研究》^⑤，是一部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影响的上乘之作。作者对美国传教士在中美两个政府之间的作用进行了讨论，对伯驾的外交活动有所涉及。吴义雄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

①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导言》，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页。

②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50页。

③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该书2005年经作者修订后再版，传教士由29名增加到32名。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④ 乔明顺：《中美关系第一页——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

⑤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动研究》^① 是研究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一部力作。该书“以较为宽阔的视野,将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②,对伯驾在华的外交活动及医疗活动做了较见功力的探讨。陈才俊的博士论文《美国传教士与 19 世纪的中美外交关系 (1830 ~ 1899)》^③,应用外交档案并广泛吸收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对美国传教士参与 19 世纪中美外交事务给予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其中对伯驾在华的外交活动论证颇详。另外,尚有几篇论文,对伯驾在华的外交、医疗活动有所论述。^④

总起来讲,中外学界在伯驾研究上已取得相当成果,对伯驾在华主要活动几乎均有涉足,但存在不均衡现状:有的方面研究已较为深入,有的方面还只是稍稍涉及。总之,许多方面仍有进一步深入挖掘的必要。尤其是迄今仍缺乏一部对伯驾在华活动及其影响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给以恰当评价的中文专著。

长期以来,在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问题研究上,中外学界曾存在“各话各说”的局面,表现为国外的研究往往忽视中文材料的运用,像赖德烈的系列著作,几乎没有使用中文资料;泰

①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② 陈胜彝:《〈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序》,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海的早期活动研究》,第2页。

③ 陈才俊:《美国传教士与 19 世纪的中美外交关系 (1830 ~ 1899)》,华中师范大学 2008 届博士论文,指导教师为章开沅教授。

④ 如易廷镇:《伯驾担任驻华专使期间的外交活动和美国对华外交政策》,载张友伦、米庆余主编:《日美问题论丛》,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汪波:《基督教传播对早期中美外交关系建立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毛剑峰、吴琼英:《伯驾与广州眼科医局》,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勒·丹涅特编写《美国人在东亚》时，仅利用其所见到的政府档案，并且在序言中直言不讳地宣称他的“观点是站在华盛顿方面，而不是站在东京或北京方面的”^①。由于没有掌握和使用中文方面的有关资料，得出的结论难免片面，因为“没有中文第一手资料根本无法弄清传教士在中国社会中的真正作用”^②，往往出现美化来华传教士的倾向。而在中国学界，则流行着这样一些观点，就是将传教士视为“一班意图控制中国思想的文化侵略者，他们的行径与其同胞致力驾御中国经济的行为，相去不远”^③；传教士传播的西学则是“以奴化思想为核心的帝国主义文化”。^④ 这些观点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随着对传教士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传教士中的佼佼者或者知名度较高者，其主要功绩或在历史上的重要表现并不在传教的成绩方面，而在于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或在中外关系史方面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有好有坏）”。^⑤ 应当说，伯驾就是这样一位佼佼者，作为美国基督教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医药传教士，在华期间，伯驾集传教士、医生和外交官于一身，对美国在华传教事业、中美文化交流、美国对华政策乃至早期中美关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将打破以往这类研究存在的

① [美] 泰勒·丹涅特著，姚曾真译：《〈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原序》，第1页。

②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导言》，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页。

③ 杜克礼撰、游丽清译：《评保罗·高汉著〈基督教的传教及其对中国二十世纪初叶的影响〉》，台湾《宗教研究》1986年第5期。

④ 李时岳：《李提摩太》，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引言第3页。

⑤ 周振鹤：《〈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序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